

·东亚文学研究(学术主持人:王升远)·

# 昭和初期日本文化人的 北京体验及其政治、文化心态

王升远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摘要] 昭和初期,随着中日对立、对抗的日益加剧及至日本对华全面侵略战争的爆发,作为域外题材资源的“北京”也在日本文化人笔下经历着由“抗日之都”、“和平之都”到“兴亚首都”、“大东亚建设基地”的形象转变。日本文化人以北京为舞台的活动,以北京为题材/背景的言论与文学创作,推动了军国主义政权与大众民族主义之间的恶性互动。同时应该认识到,尽管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日本文化人的中国观、战争观的阴晴冷暖,但以北京为外来思想资源的日本文学、思想表达并未完全被政治史、战争史切割。一方面,以横光利一为代表的一派所继承的福泽谕吉以降的“文化蔑华”思维并未因政治领域“大东亚话语”的提出而消失,且至今依然是日本对华认识的主流;另一方面,在战争炮火中,以仓石武四郎、松本龟次郎为代表的一派所继承的鹤见祐辅等前辈们理性、友善而富于良知的中国认识,尽管势力弱小却作为一条潜流绵延至今,成为中日关系“绝望中之希望”。

[关键词] 昭和初期; 日本文化人; 北京; 文化心态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145(2016)02-0085-17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16.02.013

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已冲破近、现、当代的代际区隔,“20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已蔚为风尚的今天,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再以明治、大正、昭和这样的年号为日本近代文学史划代看起来是“抽刀断水”的不智之举。思想家柄谷行人在考察近代日本的话语空间时,也指出了此类操作的潜在风险“依靠明治、大正、昭和这些年号来区分历史,就会组成一个独立的话语空间,而忘却了与外部的关系。”继而,柄谷又指出:

如果是这样的话,全部放弃用年号的区分而用西历来思考即可吗?然而,也行不通。“明治文学”并不能单纯用19世纪和20世纪这样的概念来叙述,舍弃明治这个固有名词的话就会使某些东西消失。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日本存在着特殊的“位相”或者封闭在内部的时间和空间。相反,这个固有名词包含着与外部的关联性,不允许内部的完结。而且,“明治的”或者“大正的”未必与天皇的在位时期严格对应。我们称呼“明治的”或者“大正的”,只要它们象征某一段历史的结构,就可以说它是确实存在的,废弃这样的名称就等于舍弃了这一段历史。<sup>①</sup>

收稿日期:2015-08-26

作者简介:王升远(1982—),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文学关系、中国的日本语言文学教育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侵华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项目编号:12CWW013)、吉林省社科基金“两个研究中心”专项课题“日本文化人在华北沦陷区的侵略活动及其涉华创作的翻译与研究”(项目编号:2014ZX2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T8038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文化殖民与都市空间——近代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项目编号:2014M560285)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创新团队项目“文学、学术视域下侵华时期日本对华思想战、宣传战”(项目编号:1409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

在史学界,一般以“昭和初期”指称1926至1945年的20年。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结构”,日本历史学者纘纘厚认为可以如此概括其特殊性,即“‘总体战时期的民主主义’和‘战争时期的法西斯主义’混杂的时代”<sup>①</sup>。与此相呼应,侵华战争时期极为活跃的日本浪漫派作家保田与重郎(1910—1981)战后追忆,“从现实上看,文学和思想都是空白的时代是从昭和初期开始出现的”<sup>②</sup>。若槻泰雄的表述也与此同调,“在那场民族大悲剧之下,文学史如何的贫困,足以留传后世的作品几乎没有。”<sup>③</sup>纘纘与保田、若槻有关时代政治特征和文学、思想生产的论述中存在着相当程度上的因果关系。在笔者看来,后两者所谓的“空白”、“贫困”指向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威压、胁迫、戕害所导致的文学、思想生产的“空心化”——大量炮制、畸形繁荣的国策文学、战争文学具有典型的价值空心化、口径限定化、营养殆无化的“康乐果结构”<sup>④</sup>。在这一时期“量大质劣”的“国策文学”生产线上,“中国”与“战争”依然是日本文化人们的“兴奋剂”(不论主动抑或被动,“作为日本文学课题的支那”<sup>⑤</sup>成为时代热点。这既可视作大正时期“支那趣味”之余绪,是作家试图在创作题材上有所突破的自发选择;更是军部着意引导、推动知识界关注“时局”、鼓动其支持对华侵略战争的结果,是后者在政府舆论管控高压线下有限的选项之一。

探究作为域外题材资源的“北京”在日本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的位相与意义<sup>⑥</sup>固然是本文题中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以日本作家的“北京体验”为时代标本或曰横断面,旨在考察昭和初期这一中日严重交恶、激烈交手的时期,日本知识界复杂、交错、纠缠的中国认识及战争认识。而对“内在复杂性”的追问、对其中多元交杂的混沌状态之呈现,毋宁说,其用意正在于对抗中日两国一般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论述中“一言以蔽之”的“通约暴力”所带来的遮蔽、斩经断络与绝对化倾向,及其背后急于为历史建立清晰“秩序”的进化论逻辑。

### 一、身处“排日之都”的三种批判

1928年4月,24岁的吉川幸次郎(1904—1980)来到北京大学留学。多年后,这位著名汉学家在忆及北京留学生涯时慨叹不已:“1931年是‘九·一八’发生之年,我是在此之前的四月回国的。这是怎么说呢?也算是一种幸运吧。”同时,他意识到:

更大的幸运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原则是排日。如小学教科书里就写着这样的内容,现在这方面的内容不大有人提起,总之,是一些令我们日本人不愉快的内容。如日本是如此的小国,中国是如此的大国,等等,都在教科书中写着。另外,刚到北京,首先印入眼帘的就是前门,现在也还存在着吧。

……在前门的阁楼上,每隔一根柱子就有一块大木板,上面黑底白字地写着“打倒”,然后是跳过两块木板,然后就是“帝国主义”。也就是说原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概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抗议,或是国民政府的排日气氛正好稍稍缓解,就把“日本”二字除掉了,但除掉的二块木板,谁都知道是“日本”。在北京的中心地点,挂着如此大字的大幅标语,我每次乘人力车从这里通过,总是一种复杂的心情。

这就像是一种象征,表面上是排日运动,但实际上,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日感情倒不如说是不错的。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先生们,对我这样的日本留学生是十分当回事儿的。所以,我的感觉有点像现在的美国青年来到日本所感到的气氛。……总之,当时中国对日本感情并没有口号喊得那么坏。不久就有“9·18事变”,其后又有卢沟桥事变。总之,我处于这样的一个战争的前夕时期,是一大幸运。这也是我一生中幸福的时期。<sup>⑦</sup>

在笔者看来,北大先生们对吉川的重视毋宁说折射出近代中日文化关系逆转后,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近代“先进国”、“文明国”青年时的一种复杂、微妙的文化心理——正如吉川自己所说的,那是“美国青年来到

①纘纘厚《我们的战争责任:历史检讨与现实省思》,申荷丽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

②保田與重郎『日本浪漫派の時代』(至文堂刊,1969),『保田與重郎全集』(第36卷)より,講談社1988年版,第12頁。

③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页。

④参见拙文《身份认同与战时文化、政情隐喻——佐藤春夫“时局小说”〈北京〉论》,《中国比较文学》即将刊发。

⑤郭沫若『日本文学の課題としての吾が母国』,『文芸』4卷6号(1936年6月),第47頁。

⑥对昭和前期相关问题讨论有必要了解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题材创作流变的历史脉络。请参考拙文《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及其政治、文化心态》(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大正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及其政治、文化心态》(载《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

⑦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0页。

日本所感到的气氛”。尽管面对“排日”氛围心情复杂,但吉川仍认为这是其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和日本“留中外史上的兴盛期”。在为考古学家水野清一(1905—1971)所写的挽词中他表示:

同是在北京的留学生,北边六条胡同本愿寺居住的塚本善隆及后来的大渊慧真……南边船板胡同日本旅馆一二三馆的加藤常贤、玉井是博,及其后的楠本正继,绒线胡同的奥村伊久良夫妻借住在盛伯羲祭酒故居,我也曾短期在那里居住过。西边东厂胡同有供职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杉村勇造,这些人跟住在西城的仓石先生同样也有密切的往来。这是留中外史上的兴盛期,却没有艳闻。而从日本短期来访的学者也很多,其中如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梅原末治等,也都与他结下了最深的缘分。<sup>①</sup>

这份挽词部分地勾勒出1930年代初期在京日本文化精英的人际网络。那时,与吉川同年来京、战后成为日本汉学界巨擘的仓石武四郎以京都大学副教授、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的身份留学北京大学。《述学斋日记》记录了他与吉川身着中国人服饰一丝不苟地学着汉语,与陈寅恪、陈垣、吴承仕、马裕藻等交游并向其请益的平淡日子。这两位立足中国思考中国、与中国学者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支那通”青年之“幸福感”恐怕只是在华修习汉学这一特殊情境所营就的学院派“学者幻觉”,很难将其视作判断现实层面中日关系的依据。事实上,出了中国,“中国化”的生活方式便给仓石带来了麻烦。1930年8月5日归国时,仓石在神户港便遭遇了非难“关吏待余以支那人,言语无状,遂告其令,伊仰天无言。然而待遇中国如此无礼,可想而知,神户国门有此失态,国耻莫之甚矣。”<sup>②</sup>“支那通”青年的愤怒可见一斑。最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日本政府有关侵略战争的言论管控极为严厉的1942年,仓石仍以极大的勇气坦言“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思考,对于中国必须承担的责任,也一年重似一年。正因为如此,指导者应有的宽阔胸襟,并籍此反省自己的事情也很多。”<sup>③</sup>在日本文学的“全黑时代”,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提出的这一建言展现出的对华善意以及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良知弥足珍贵。

在吉川、仓石来京的同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同年6月21日,改北京为“北平”<sup>④</sup>,设北平特别市。北京从“帝都”、民国“首都”转变为“中华故都”、“文化古都”,但其在教育领域的核心、关键地位依旧,被国际人士称作“中国的波士顿”。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这一重大变动相应地影响到日本文化人观察北京的视角。1930年11月,受满铁邀请,歌人斋藤茂吉(1882—1953)赴“满洲国”与北京访游。在其后出版的《北平游记》中,作者便使用了北京的新名——北平。作为歌人,他在《连山》中留下了吟咏北京名胜与风土人情的和歌。来京路上,斋藤从“山海关上能看到日之丸旗帜,那里站着两个日本兵士”,在秦皇岛也看到了一个日本兵,“这里离海近,据说日本船也会来到这里”。11月9日晚,斋藤抵京,住在日本人经营的扶桑馆。他表示,“满洲—北京”之旅最让其在意的是中国国内的“排日”氛围,滞京期间他还得到了东亚经济调查局编译、新近出版的《支那国定排日读本》。<sup>⑤</sup>在该书中,编者佐藤贞次郎节选了当时中国学校教科书及报刊中记载的“排日事件”并冠以“国定”二字,试图面向日本读者制造中国民众的抗日运动根源于政府鼓动的舆论倾向。有论者指出,“日本视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为国民政府推行反日教育与反日政策的结果,过分夸大报道在个别地区发生的反日事件——其中不少是日本军人等谋略所为,致使对华‘恐怖感’与憎恶感在日本人中间扩散。负责外交交涉的外务省官僚们批判中国政府从背后操纵‘反日’运动以利于对日交涉。”<sup>⑥</sup>在“排日”的意义上,北京之行似乎使斋藤在实际的中国体验与手中读本之间发现了对应关系。参观北京首日,作者即看到了处死马贼的一幕,并听到周围的日本人议论“昨天那家伙在从扶桑馆前路过的时候,说了句‘日本鬼子回去吧’”。13日在去琉璃厂的途中,又看到了和平门那里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字。为此,在作一些

①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君挽詞』(初出:1973年5月『水野清一博士追悼集』),『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より,筑摩書房1986年版,第636頁。

②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7頁。

③倉石武四郎『燕京大学の落成式』(『文芸春秋』1942年1月号),引自仓石武四郎《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5頁。

④1938年4月17日日军扶持下的伪临时政府改北平为“北京”,在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国民党政府又将北京改为“北平”。居住在北京沦陷区的青年以使用“北平”来显示自己的气节。

⑤斋藤茂吉『満州遊記・北平遊記』,『斎藤茂吉全集』(第7卷)より,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234頁。

⑥刘杰《“反日”、“反中”循环中的日中外交——满洲事变前夜》,收入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等著《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頁。

伤古咏今之歌的同时,斋藤还留下了这般句子:“轻蔑日本之字,刻在了正阳门上,那里人头攒动。”(“城门城墙”之一首)“排日之思想,斯乃近代之产物,典籍谐调无之。”(“北平图书馆”之一首)<sup>①</sup>斋藤认为,“今日支那的对日政策可以‘排日’之一言以蔽之。然对于这一政策,‘日支亲善’究竟何意?我国一边着眼于满蒙、将之视作日本生命之源泉,一边承受着这等侮辱性的抵抗还要‘亲善’是何道理?……不单是我这一个旅行者,我国全体国民都必须了解这一现实。”<sup>②</sup>质言之,斋藤要表达的乃是对承受了“抵抗”却求“亲善”的日本当局对华政策之不满。历史学家江口圭一在讨论“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人中国观之成因时指出:

民众对战争的支持,还由于日本人的思想深处对满洲有一种顽固的特殊感情。满洲事变开始时,日俄战争刚刚过去26年,往事如昨,在一般日本人的观念中,无不认为满蒙权益是通过日俄战争(及甲午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换来的。这种观念进而又发展为满洲是日本的“圣地”和“生命线”思想。在这种思想观念下,他们根本认识不到是日本侵略了中国,相反,正像下面这封慰问信所说的那样,认识和愿望已完全颠倒。信中写道“支那的坏军队想把日本人赶出满洲,实在坏透了,用大和魂武装起来的强大无比的军人叔叔们,请牢牢地保卫这样重要的满洲吧!”(天津市小学五年级一男生)<sup>③</sup>

如此观之,在北京的斋藤茂吉对中国的“排日”之思考与心智未熟的儿童全无二致——批评抵抗却不问所以然。如果说这种有意的“不求甚解”甚至曲解迎合了一般民众对满蒙局势、中日关系动向的集体认知;那么,“一边承受着这等侮辱性的抵抗还要‘亲善’是何道理”的表述则显然意在呼吁更为强硬的武力解决,这与其时日本对华总体战略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同构性的。江口圭一将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视为“对英美协调主义”与“亚洲门罗主义”对决、后者最终压倒前者而主导了潮流的历史,此说堪称洞见。而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后者已逐渐占据压倒性优势。“五·一五事件”使天皇制立宪主义政治体制的立宪主义侧面遭受沉重打击;另一方面,“民众对排外主义战争的支持,正是使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归于失败、使亚洲门罗主义路线取代对英美协调路线并得以巩固的决定性条件。”<sup>④</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国主义政权与大众民族主义之间形成了恶性的双向互动——前者动员了后者,而后者又反之强化、支撑了前者的合法性,与前者形成了共谋、共犯的利益、命运共同体。这种内部高度一致、批判声音缺失的思想状况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愈演愈烈,后文将提及的多数文化人便是坐在这战车上驱驰(无论被迫迎合还是主动投怀送抱)并为之辩护的案例。

面对所谓“排日”风潮,也有少数正直、敢言的“知华派”知识分子不为国内政界、新闻界之耸动所迷惑,敢于揭穿谎言,对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发出警告,日语教育家松本龟次郎(1866—1945)即为一例。松本是鹤见祐辅《北京的魅力》的读者与信徒,他于1930年来华,并将其旅程及观感写成《中华五十日游记》。一向爱护、同情中国留学生的松本认为:

向来,无论是亲日还是排日,悉为我国对支政策之反应,且也未曾有对我全体日本国民倡导排日之事。显然,若国际问题能顺利解决,则排日运动可即日而熄,复归亲日。当然,我虽是政治门外汉,但也并非不知在国权主张方面,我们经常无暇顾及对方国家的感情。唯感政治家之言行,对于中日亲善之影响极为重大,这是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立场所痛感而不能不首先在此提出的。……

民国现今已有民族觉醒意识……要言之,“打倒帝国主义”思想之影响既深且广,尤其是对中小學生,其鼓励最为周到。当此时,日本人若仅恃一日之长,依然沉醉于日清、日俄战争胜利之旧梦……实属大错。……对列强而言,今后若依然(对华)施以旧时之压抑手段,则民国终将奋起反抗,对施压国而言,非但终将一无所得,且徒贻永久之恶感。<sup>⑤</sup>

如所周知,松本是中日“亲善论者”<sup>⑥</sup>,其受教者中有鲁迅、秋瑾、周恩来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镇。上述言论不过道出了延至今日依然有效的中日关系之常识,但若置于1930年前后的中日政治语境下思考,这一执中之见却显得有些异类。在北京,松本在参观了故宫的宝物后称“报纸上传言说要将这些宝物全部典当

①斋藤茂吉『北平漫吟』,『斋藤茂吉全集』(第2卷)より,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308-309頁。

②斋藤茂吉『北平漫吟』,『斋藤茂吉全集』(第2卷)より,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238頁。

③江口圭一:『1931—1945 日本十五年侵略戦争史』杨栋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頁。

④江口圭一:『1931—1945 日本十五年侵略戦争史』杨栋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

⑤松本亀次郎『中華五十日遊記・中華留学生教育小史』,東亜書房1931年版,第75、124頁。

⑥松本亀次郎『中華五十日遊記』,東亜書房1931年版,緒言第1頁。

以为北军的军用资金止于传言可喜可贺。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能切实制定出保存之法,因为它们不仅是中国的国宝,而且其超越性的艺术品乃至历史性的参考品都是世界人类之宝。”<sup>①</sup>松本的中国之行是在充分阅读、消化了同时代人中国纪行的基础上实现的,在古都旅途中,他便曾引述里见弢和鹤见祐辅的“北京论述”并大表认同,其超越了个人情仇、民族恩怨的情感层面,以及对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珍视与鹤见祐辅有殊途同归之妙。同时,松本也批评了部分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蔑华倾向:“不仅是文士,在对中华不友好人士的纪行文或感想文中,类于酷评者甚多。民国人士则以他山之石视之,或将成为一种教训。在无益于他之前,先伤己德,又恐有助长本国人自恋心之虞。”<sup>②</sup>近代以降,在黑格尔式亚洲思维影响下,日本文化人的涉华记述中充斥着蔑视、贬损,如此说来,松本龟次郎的存在是应该被铭记的。

德不孤,必有邻。松本之邻至少有文明批评家、思想家长谷川如是闲(1875—1969)。在一般日本“文明人士”视中国为野蛮国、视中国人为低等动物的时代,他却反向指出了以中国人为参照的日本人、西洋人中的“兽性”。在1937年元旦发表的一篇短文中,长谷川称在“一个夏天,是北平还叫北京的时候”,“我”和几个日本人去远足,一行人到河堤上的茶馆休息:

同样去休息的便是刚才说的那种风格的人物。年龄看起来在五十前后的样子,那淡青色的长褂被风吹拂,飘然而动,真是一位有着古典气派之人。同是文化人,但与第一次在巴黎郊外的咖啡店坐在露天椅子上看到的那位一边与空气对峙着、一边滴溜溜地转着桌一般眼睛的、滚圆肥胖的法国人感觉大不相同。或许是文明的类型不同之故,两者的感觉比较而言,总感觉支那一方在人性方面要洗练得多。超然这一点,法国人也是如此;但那种是西方式的,这边却是东方式的。我们一行当中,就是年纪有点轻,也还是有日本的官吏和读书人的,虽是远足的装扮,但毋庸讳言,在文化风采上,与前述的那位支那人无法相提并论。……

那次远足的时候,看到了元代的土城,而后去了俗称大钟寺……因不识路,便托村里的一位十二三岁的孩子带路。这是一位浓缩了支那文化的、风采奕奕的少年。……

古典的村中绅士,有着支那文化韵味的小少年,又遇到了这位(此军士觊觎作者新买的骑马用的裹腿——引者注)吵吵嚷嚷的军士,确实,许多日本人只看到了支那之一斑而无以知全豹也就不奇怪了。<sup>③</sup>

1932年1月16日,鲁迅在致日本弟子增田涉的信中说:“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大抵抱着成见来支那。来到支那后,害怕遇到与其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因此来与不来一样。于是一辈子以乱写而告终。”<sup>④</sup>长谷川以其在京亲历对试图“窥一斑而见(中国)全豹”者或对中国抱着成见者予以批判,在中日国益纠葛、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里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本色。作为现代日本国家批判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长谷川与鲁迅有着近似的“杂文气质”和“国际视野”。在论及日本文化、思想问题时,常引国外思想资源为批判之资,因此以鲁迅的评论来思考长谷川如是闲的日本批判是合适的: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sup>⑤</sup>;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的东西,他就给它取了一个不大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text{人} + \text{兽性} = \text{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讽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sup>⑥</sup>

## 二、“国益论”规训下的“和平之都”

继田山花袋之后,1935年另一位自然主义文学大师正宗白鸟(1879—1962)来京。他自述来京因由:

①松本龟次郎『中華五十日遊記』東亜書房1931年版,第156-157、161頁。

②松本龟次郎『中華五十日遊記』東亜書房1931年版,緒言第7頁。

③長谷川如是閑『語は語る(支那のある小鼻)』(『改造』19卷1号,1937年1月1日,『長谷川如是閑全集』(第1卷)より,岩波書店1989年版,第340-342頁。

④鲁迅致增田涉(320116),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195页。

⑤该书由改造社1924年5月出版,内收《中国人的脸及其他》一文。

⑥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作于1927年4月6日),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433页。

我在北平的书店里读到一位名叫 Hayes 的美国人所写的题为 *At Home in China* 的支那旅行记。开头就写道：

“我曾某杂志读到‘予欲住在支那、特别是想住在北平’的感想。那个感想的作者赞赏北平的居民及其风俗，还有那里的气候和风景；还说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厨师，其烹饪技术兼备了法国的空想力和德国的实质性。读了这个报道我就计划到此一游了。”

我也是从朋友那里听到了许多与此报道同样的溢美之辞，心想，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地方，应在有生之年看上一眼，于是突然计划、突然来到了这里。……

在西人眼中，他们将 Japan 空想为一个黄金之国，将攀登万里长城空想为冒死的痛快之事。这在遥远的过去也不是不可思议的。而即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邻国的我们还将北平作为异样的土地，做着各种空想。——但，来到这里一看，却并非如此。（但也不能不说，要看过过去北京的面影须要趁现在的时机）<sup>①</sup>

白鸟称与其同住于北京饭店的一个美国女作家 Kathleen Norris 在谈到“关于北京之感想”时说“我喜欢北京，这里漂浮着和平的空气，并且这里的空气有着自己的故乡旧金山空气的气息，easy to breathe。”对此，白鸟表示无法苟同“诺里斯女士和我这样的人，只能感受到漫游者的皮相，或许北京现在正被令人窒息的氛围包围着亦未可知。读过支那文报纸、英文报纸和当地发行的两种很小的日本报纸，我也并非没有察觉到某种不稳的情势。”<sup>②</sup>不难看出，他已意识到北京将出现“大变局”，因此主张“要看过过去北京的面影须要趁现在的时机”。同年暮夏来京的阿部知二也有同感。战争爆发后的 1938 年，在长篇小说《北京》的跋语中，阿部追忆 1935 年来京时的感受称，“一方面，看似和雅的北京空气中，有种暴风雨般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即便是凭一个旅人的嗅觉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北支，自北、自南、自东、自西的民族之力、政治之力、思想之力变成了旋涡彼此冲突着，难逃不定何时便会转变为武戏或是悲剧舞台之命运。”<sup>③</sup>

与田山花袋一样，正宗白鸟未曾在北京发现其期望中的“艺术美”：“北京就是如此沉稳的都市。但却没有接触到让我们积极地陶醉于艺术美、动人心魄之物。尽管来到了这个城市，但我还与从前一样，与支那趣味有着难测的悬隔。”<sup>④</sup>对艺术失望的同时，他却有了另一个重要收获“说到物资丰富，到故宫博物馆去一看……可以知道，在这老朽大国之地下，现在还埋藏着高价的奢侈品。不仅是日本，领着世界文明国的女性参观这里的宝石街，想必也会让她们垂涎欲滴，激起她们对支那国土的所有欲和占领欲吧。”<sup>⑤</sup>由此可见，时至 1935 年，日本文坛的右翼化程度之剧。军国主义者且不论，即便是鲜涉政治的文坛大家也丝毫不掩饰现实层面上对中国的领土欲望。

随着中日的对峙关系愈发难解，作为创作题材的中国日渐受到日本文坛关注。1936 年，在文学界颇有影响的《文艺》杂志便发起过“去描写支那吧！”专题讨论，约请逃亡在日的郭沫若、小说家藤森成吉（1892—1977）以及日本评论家兼翻译家新居格（1888—1951）撰文探讨。这组文章可视作日本文学界的反躬自省，旨在探求中国题材创作不振、水准低下之因由。在《作为日本文学课题的我的祖国》一文中，郭沫若指出，森鸥外、夏目漱石以降，中国题材日本文学作品为数不少，而“近年来”文艺界对中国之亲和力减退的原因在于“外在的阻碍与内在的踌躇形成的力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敏感而脆弱，对于作家而言禁忌颇多，加之日益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sup>⑥</sup>，所谓“外在的阻碍”自不难理解。郭氏认为，“日本作家好写我国的历史题材，或即便取材自现代，亦有靠想象加以充实的倾向”。因此，在他看来，“在将中国作为课题之前，积累有关中国的体验是第一要件。欲积累体验，最合适的办法便是跨过黄海，至少经历一两年的中国生活之修

① 正宗白鸟『北平にて』（『読売新聞』一日一題欄、1935 年 11 月 9 日，『正宗白鳥全集』（第 10 卷）より，新潮社 1976 年セット版，第 458—459 頁。

② 正宗白鳥『北京印象記』（『中央公論』第 50 年第 12 号，1935 年 12 月，『正宗白鳥全集』（第 10 卷）より，新潮社 1976 年セット版，第 462—463 頁。

③ 阿部知二『北京』第一書房 1938 年版，第 278 頁。

④ 正宗白鳥『北京印象記』，『正宗白鳥全集』（第 10 卷）より，新潮社 1976 年セット版，第 470 頁。

⑤ 正宗白鳥『北京印象記』，『正宗白鳥全集』（第 10 卷）より，新潮社 1976 年セット版，第 469 頁。

⑥ 实际上，单是郭氏这篇短文便前后六次出现了省略号，不难看出，这是杂志社为避新闻审查而作的不得已的删改。

业。”<sup>①</sup>郭沫若所主张的实地探察所指向的是日本文学界对现代中国的虚构性想象。在《去描写支那吧!》中,藤森成吉也表达了对中国题材创作现状的不满,但论旨却与郭氏大异其趣:

我们必须去描写支那,这并不单单因为她是我们的邻国。现在,对我们而言,支那是超越了邻国意义的存在。其命运与我国、与我们的命运息息相关。处于如此密切而微妙关系的国家,近数十年来绝无仅有。

此外,描写支那,我们有着比任何国家的人都有利的条件。因自古以来的接触和文化的交流,我们对他们的传统、心理与生活等了解得最为深刻,文字有着共通之处,旅行也很便利。而日本文学中描述这个国度之人与土地的里程碑式作品至今尚未大量涌现,毋宁说是不可思议之事。……在支那作家要描述本国的真实景况而受阻之时,日本作家应敢于担负起这项工作。<sup>②</sup>

藤森的论述中有如中日间“密切而微妙关系”、两国人命息息相关等看似不言自明的表达,这些都是洞察其真意的密码。尽管他自诩“我爱支那及支那人,这与那些所谓政治家们的应景话和骗人的日支亲善是全然不同的心情”,但在日本对华鹰视狼顾且已采取了切实侵略步骤的1936年,这种鼓动日本文学界关注中国题材的吁请与大正诗人小林爱雄鼓动日本人“开拓支那”的呐喊,以及侵华语境下政治家们有关“日支亲善”的虚伪标语、口号如出一辙。有所不同的是,藤森居然判定中国作家无法揭示中国的“真实景况”,此项工作需由“闯入者”日本人代劳。

在《现代支那的题材性》一文中,新居格则对大多数西洋人的中国论述不以为然。他认为,西洋人对中国的观察过于皮相,那是租界中国、宾馆窗口的中国,唯独赛珍珠是其中的异数。作为《大地》的日译者,新居认为赛氏表现了贯流着一般中国人情感的、不变的中国,并转述谷崎润一郎的评论,承认“日本作家在了解支那这一点上尚逊赛珍珠女士一筹”。1938年,赛珍珠凭借中国题材长篇小说《大地》获诺贝尔奖,而早在1932年该作获普利策奖时,她已蜚声世界,这也极大刺激了日本文坛。新居格坦言,(我们)在何种程度上正确认识(了中国——引者),我没有自信”,还特别批评了日本作家对中国农村题材的忽视,他敏锐地意识到农村才是理解支那的钥匙。“像赛珍珠女士那样长期亲近支那生活、能像支那人一样说支那语、理解支那农村及农民的状况与感情诸条件的作家,我国可以说曾无一人。……这不是文学家的才能问题,毋宁说是由于缺乏作品创作前生活准备的蓄积。”<sup>③</sup>而这一切,在“卢沟桥事变”后便不再是问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故都即将沦陷、中国民族面对生死存亡的时刻,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愤然指出“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继之,7月29日,北京沦陷,成为日本所谓“东亚建设的基地”。其间,7月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由丰台乘卡车进入北京时,中国军队突然封闭广安门将日军分割,并发动猛烈进攻。日军少佐樱井德太郎(1897—1980),面对二十九路军炮火,由10米高的城墙上跃下逃命。1939年,樱井出版了评论集《广安门》,详述了事变前后身兼宋哲元第二十九军顾问和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以及日军少佐诸重身份的自己在中日之间全力斡旋之经纬。众所周知,事变的导火索是一个日军兵士的失踪,日军以此为口实,挑起战端。在该书中,作者承认失踪的兵士翌日即归队,并未被中国守备部队击毙,<sup>④</sup>从而作为敌方亲历者证实了日军寻衅挑战的非法性。如此说来,该作具有“立此存照”的史料价值。跳出历史叙述,作者在前言中盛赞“日本军队的突击英姿真如神灵,没有任何私心,只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死去”;同时批评“最近很多人喊着去支那、去支那,这真是件可喜之事。然而,这都是些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一般来到支那巧妙赚钱、而后逃归内地之辈。如此下去,英灵们必会挥泪九泉吧。”<sup>⑤</sup>在面向日本读者盛赞日军在侵略战争中的英勇表现之余,鼓动来华日本人留在中国以共襄“殖民大业”。

在大举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协力战争。事变爆发几天后的7月11日,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的当天,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

①郭沫若『日本文学の課題としての吾が母国』、『文芸』4卷6号(1936年6月),第49-51頁。

②藤森成吉『支那を描け!』、『文芸』4卷6号(1936年6月),第37-38頁。

③新居格『現代支那の題材性』、『文芸』4卷6号(1936年6月),第101-106頁。

④桜井德太郎『广安門』,刀江書院1939年版,第32-35頁。

⑤桜井德太郎『广安門』,刀江書院1939年版,第1-2頁。

其“协力”战争;13日又召集著名杂志社代表,提出同样的要求。8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许多综合性杂志和文艺杂志,开始采用战时编辑,开辟专门刊登战争报道和战场特写的栏目。由于此类涉战文章在读者中大有市场,不少作家被以“特派员”、“从军作家”身份派往中国战场,写作“現地报道”和“从军记”等,当然,这些创作都必须谨守军部设定的“政治红线”。火野葦平因“士兵三部曲”而被奉为“国民英雄”、名利双收,而石川达三则因在作品《活着的士兵》中反映了日军的残暴兽行而闯下笔祸,这两起人尽皆知的文坛事件对于前述特派员和从军作家而言,其规训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需提请注意的是,报社或杂志社特派员的身份使作家假想的读者群发生了巨大变化,大众媒体使作家的读者群由纯文学爱好者转变为一般大众,作家的写作须顾及一般大众的趣味及其关切,这是近代“新闻主义”的重要特征。侵华时期,日本国家机器(主要是军部)的意志、报社/杂志社的利益、作家的现实处境,以及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涉及侵略战争的交错点上形成了高度的同向性,彼此之间甚至是相互塑造、相互规定的关系。

1943年东亚新报社社长德光衣城在为高建子(即高木健夫)的《北京百景》所撰写的“必胜序曲”中指出,“近四五年来,描述‘北京’乃至北支处处的人逐渐增多,考虑到此乃大东亚建设的基地,自是理所当然之事。”<sup>①</sup>“卢沟桥事变”使古都门户洞开,来京日本人一时如过江之鲫。8年间,川端康成、伊藤整、吉川英治、小田岳夫、岸田国土、佐藤春夫、阿部知二、横光利一、村上知行、山本实彦、一户务、高建子、奥野信太郎、桥本关雪、清见陆郎等知名文化人纷纷以从军作家、报社特派员等身份来京踏查、报道、写作。仅木村毅编《支那纪行》(第一书房,1940年版)中便收入了战时体制下不少日本作家的中国纪行,其中就囊括了吉川英治、阿部知二、伊藤整、小田岳夫等文人的北京纪行文可资参考。

事变发生后,创造社社长山本实彦(1885—1952)以新闻家的嗅觉,在未知会任何方面的情况下孤身来京采访,旨在向日本国内传递北京的新动向。1937年10月,创造社出版了他的《纵贯大陆》。作者记述了他对华北军最高指挥官寺内寿一以及“北支临时政府”的要员王荫泰、汤尔和等的采访,并对这些左右华北局势的中日军政精英的思想、行动倾向作出论评。而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其作为新闻家对沦陷之初北京社会的思考维度。在“北京”一节中,山本氏开宗明义地表明“这次纵贯北支、中支,最为平稳的便是北京。在北京去看电影、看戏,一个人出门首先不会觉得危险”。与先于自己来京的前人相同,山本也会去戏院看戏,但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与其说是去看戏,毋宁说是视察这种时局下的看戏观众,是去观察所谓事变下这些大众的态度。尽管如此,大众的态度平静地超乎想象,计划中的视察目的早已不知所踪,我竟与观众们一起看起了戏。看戏期间,未有被人以凶险的眼神瞪着或以冷酷的眼神打量之感。支那人的性格真是难懂。”<sup>②</sup>1937年11月作为《文艺春秋》杂志特派员被派往华北战场、在北京得奥野信太郎之向导<sup>③</sup>的作家岸田国土(1890—1954)在《北支物情》也描述了观剧时类似的感受“观众席超满员,入场费也比平时高了许多。支那人、特别是北京人对戏剧的狂热果然名不虚传,那是一副将国家安危置之度外的陶醉神情。”<sup>④</sup>在极易被国家意识形态动员起来的日本文化人(如山本和岸田等)眼里,北京人的“难懂”恐怕就难懂在身在沦陷都市中、面对敌人与炮火时置若罔闻、国家存亡似乎与个人安危无干的平静或曰冷漠。岸田之所以在“逗留时日极少”的情况下仍去看戏,是由于他最想见的是与事变有关的人、最为关注的是“北京之现代相”<sup>⑤</sup>,为此,他留意的是车站巡查与人力车夫的关系、战争爆发后北京市民的动向以及学校教育情况等。

同时,岸田承认了一个其他作家鲜见承认的事实“无论我是多么地‘客观’,恐怕都是徒劳的。因为,不必说,我只能‘作为日本人’面对这场战争。现实地报告对国家、国民有害无益的情况下,我只能沉默。首要地,我要祈祷这场战争给祖国带来幸福。牺牲只因此而值得敬重。”<sup>⑥</sup>换言之,即基于国益取向的选择性呈

①高建子『北京百景』,新民印書館1943年版,「必勝序曲」第1頁。

②山本実彦『大陸縦断』改造社1937年版,第78-79頁。

③岸田国土在从日本出发前,阿部知二向其介绍,到京后一定要与S·O联系,这位O先生乃中国文学专业的庆应大学年轻教授,并曾向其介绍北京的情况,由此可断定此人应为奥野信太郎(Okuno Shintaro,按英文式姓名简写表述方式即为S·O)。(岸田国土『北支物情』,白水社1938年(再版),第229-230頁。)关于奥野信太郎的北京题材创作,可参见拙文《奥野信太郎:精神故乡的面影》(载《书城》2015年6月号)。

④岸田国土『北支物情』,白水社1938年(再版),第233頁。

⑤岸田国土『北支物情』,白水社1938年(再版),第230頁。

⑥岸田国土『北支物情』(『文艺春秋』15卷14号,1937年11月,『北支物情』より,白水社1938年(再版),第252頁。



现:选择对日本侵华有益有利的素材加以报道,渲染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沦陷区之和平、进步与繁荣,对那些可能使日本遭受国际、国内正义力量谴责的侵略暴行及其影响则避而不谈。“他们不可能写实际情况……大部分人不言而喻地按照军方的意图——写了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手记和小说来极力鼓舞国民。”<sup>①</sup>《都新闻》特派员井上友一郎(1909—1997)在《从军作家的问题》中透露他曾得到一份《从军作家行动表》,上面明确规定了与国策一致的写作原则。<sup>②</sup>选择性的呈现与遮蔽在日本全面侵华时期是极为常见的,这固可视作战时体制下无奈的选择,但其在客观上纵容了法西斯政治权力、协力了侵略战争的一面不容否认,这也是战后不少日本文化人被追究战争责任的因由所在。

比起底层社会,山本实彦更为关注北京知识界的思想动向与活动。在《北支的文人们》中,山本将北京文人分为抗日派和留京派;又将后者分为“与新政府合作派”及“旁观变动派”。山本并不认同中日政治家将华北农民安否视为首要大事的主张,他指出安抚大学、专门学校失业的教授方为急务“我们必须思考北支失业的知识阶层将往何处去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认为,迫于强大的武力压迫,这些人会雌伏起来,而一旦压力减弱,他们又会站在第一线继续前所未有的抗日运动。”<sup>③</sup>为此,山本频频拜会文坛重镇、“知日派首席”周作人以及钱稻孙、徐祖正、汤尔和、尤炳圻、苏民生、王谟等文化、政治精英。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来访者在与知识分子的接触中产生了与戏院观戏不同的沉重感“与这些人的会面第一感觉是,他们似乎被什么压抑着,一句句的应酬都很沉重。自己的祖国在革命路上之时,由于不得不身处旋涡之中,痛苦之事自然是有如山多。我理解他们无法淡然处之的心境。”<sup>④</sup>在这里,山本偷换了概念,把“侵略战争”美化成了“革命”。在同月出版的《支那事变(北支卷)》中,山本实彦全面介绍了开战两月后的北京局势,继续嘲笑原本在大学主导着抗日运动、而今沦为乞丐、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南迁的大学教授们“生平常见山东、河北的苦力们,今天在这里见到的人群多是白面书生和细皮嫩肉的美女。是因国家败亡而四处奔逃的、多有忧色的上层及中流人士。……他们的脸色明显不佳,打不起精神,似乎也看不见希望。而他们面对我的时候却眼睛发光,表现出一副咬牙切齿的敌忾之气。”<sup>⑤</sup>这种“敌忾之气”与前述观戏民众的麻木形成了鲜明的比照,提示出在亡国困境下知识阶层的激愤与可能继续下去的抵抗,对于闯入者而言这是极其危险的。为报道北京知识界的动向、有效消解留京知识阶层的抗日意识并拉拢其归附,事变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报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文艺春秋》、《文艺》、《大陆》、《新潮》等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纷纷参与对事变后华北文化建设问题的报道与讨论,以现地访问、报道、座谈和评论等多种形式表现出强烈的介入意识。其中,北京沦陷的8年间,日本知识界对周作人、钱稻孙的关注具有相当的持续性。<sup>⑥</sup>作家小田岳夫(1900—1979)更是在长篇小说《北京飘飘》中以周作人为原型塑造了北京大学教授“田有年”的形象。<sup>⑦</sup>小说呈现了北京沦陷初期,以“田有年”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闯入者、日伪政权间时而合作、时而敷衍、阳奉阴违的生存状态;同时勾勒出日本文化人对留京中国同行既欲笼络使之“协力”侵略战争又对其心怀疑忌的复杂心态。日本新闻界对北京亲日派文化人的试探、关注与拉拢,对抗日知识分子的嘲讽显然意在稳定华北沦陷区的知识界局势,打击抗日势力,具有配合政治、军事侵略的“舆论宣抚”性质。

与山本一样即时地关注“卢沟桥事变”后北京知识界之变动的还有中国文学家、翻译家一户务(1904—?)。自称“爱着北平,并做着在此终其一生之梦”的一户从刚成为“战迹”的卢沟桥入手介绍了开战月余北京的局势,声称不希望中国故都在战火中化作青烟“只要文学之梦未曾远去,北平便是带着哀愁的、

①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页。

②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0页。

③山本实彦『大陸縦断』改造社1938年版,第294—295页。本节又于1938年9月27—29日分上、中、下三节连载于《东京日日新闻》。

④山本实彦『大陸縦断』改造社1938年版,第294—297页。

⑤山本实彦『支那事变(北支之卷)』改造社1937年版,第86—87页。

⑥管见所及,就有如下文献涉及『北支文化建設の礎——親日学者と支那事变を語る』、『報知新聞』1937年10月21日(朝刊2面);中村亮平『北京の文人』、『大陸』4卷6号(1941年6月)第180—183页;奥野信太郎『北京の日本学者——老北京第二話』、『文艺春秋』17卷8号(時局増刊),1939年4月,第186—193页;山本实彦:『この頃の周作人』、『文艺』6卷10号(1938年10月),第236—245页;寺島特派員:『新民主主義を基調に生まれ出づる悩み:戦後北京の文化を見る』、『報知新聞』1938年7月14日(朝刊)4面;橋川時雄『北京文学界の現状』、『朝日新聞』1940年2月25(朝刊)7面、26日(夕刊)5面。

⑦参见拙文《战争期间日本作家笔下周作人的实像与虚像——小田岳夫〈北京飘飘〉中“田有年”之原型初探》,《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

值得去爱的都邑。”相比之下,一户似乎更愿谈及北京的变化:

近来,北京的故都哀愁正逐渐褪去,北平不再是以前的北京,也不再是从前的燕京。这里开始出现舞厅、城墙上开始挂起了霓虹灯,开始出现一家家的关东煮、鳗鱼店,这已绝非故都北京。然而这里仍是有着紫禁城、有着牌楼、街上响着京腔的都城。北京的支那古风文化,此次事变之后将会更加国际化吧。<sup>①</sup>

关东煮、鳗鱼店等的出现已是日本对北京经济殖民、文化渗透的表征,而这一切在一户看来不过是北京“近代化”、“国际化”的结果,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被完全置换、抹煞了。安藤彦太郎指出,“曾在满铁调查部推进过‘科学的’中国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中,很多人是讲座派。他们中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说中国是停滞的亚洲式的社会,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近代化,只有依靠来自外部的冲击才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根据这种理论,日本侵略中国也等于是帮助中国进步了。战争期间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用这样的‘理论’协助了战争。”<sup>②</sup>如是观之,一户的思路与此类“讲座派”学者异曲同工。此外,他还指出,北京的大学虽名为国立,但运行机制都是欧美系的,因此,英、德、法文学研究兴盛,而从事日本文学研究者则寥若晨星(除北平大学的周作人、徐祖正等二三人外)。一户站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的角度指出,“东洋两国家之间的交流寥寥无几,抗日思想的涌现多半可归因于此。以大学为中心,欧洲的文化势力逐渐使西欧之学侵入青年人的头脑中,使得本应相亲相爱的东洋诸民族却在背后、不知不觉之间相互争斗。只有从支那的大学中撤销轻薄的欧美文化,方可成就东洋和平之源流。”<sup>③</sup>简言之,即应在北京高校系统清除欧美影响,强化日本色彩,以促进中日“相亲相爱”、“东洋和平”,消弭中国人的抗日意识。沦陷后的北京,以伪北大为代表,纷纷重建因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而停办的日本文学专业,日语几乎成为各校各专业的必修课,或许便是重绘北京“东洋色”的重要表象。

### 三、“兴亚首都”的“日本色”与“道义的生命力”

一户有关清除欧美文化影响、抬高日本价值的话语甚至走在了政界推动的“泛亚主义”政策之前头。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首先抛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计划。日本通过对权益圈的要求将东亚地区作为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亚”而重新建构,最终又将“南方”作为不可或缺的补给基地纳入“大东亚”整体权益版图,排斥欧美在亚洲的利益。因此,这种泛亚主义政策实质上是“亚洲门罗主义”。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来京日本知识分子对军国主义政府所提出的泛亚主义话语多是积极呼应,相关表述在其各自创作中比比皆是。

1941年东京的大都书房出版了其时在北京任日语教师的清见陆郎(1896—?)的《北京点描》。是书收入25篇小文,从北京的“古都风趣”、古建筑谈到“新东洋艺术”,从中日语言问题、宗教问题谈到“日支文化提携”。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亚新报社社长德光衣城支持出版的两位作家——歌人吉植庄亮的弟子、从军记者早濑让(生卒年不详)和新闻家高木健夫(1905—1981)。由北京特别市市长余晋猷(1887—?)题签的《歌集北京》是早濑的处女作,作者在后记交代该集创作之经纬时称:

歌集《北京》中收录之和歌约三百五十首,均是在大陆期间创作的,故取名《北京》。特别是歌集中的战斗吟,乃我作为京都日日新闻社的从军记者,自昭和十四年(1939年——引者注)一月末始在转战华中第一线之藤江部队的从军笔记中摘录的,是我超越了生死线而得到的纪念品。其他作品是昭和十四年七月一日东亚新报社创设之际,我由京都日日新闻转投德光社长至今创作的作品,从作品数量上而言,昭和十六年(1941年——引者注)的作品居多。<sup>④</sup>

就艺术性而言,此歌集收录的作品无甚可观者,反倒留下不少“中日提携”、“东亚共荣”的政治印迹。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歌人歌曰“胡同里/贴着两张和善的面孔/近卫公与汪精卫氏高呼防共”。(41页)在“随感”中,有歌曰“从大梦中醒来/且听‘共存共亡’的呼喊!(向大东亚共荣圈迈进)”(91页)。此外在“北京”(144页)等和歌中,为“新秩序建设”出谋划策、摇旗呐喊的诗句屡见不鲜。诚如吉植庄亮在为本歌

①一户務『北支事变と北平文化』,『新潮』34卷9号(1937年9月),第187页。

②安藤彦太郎《日本研究的方法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和相互理解》,卞立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③一户務『北支事变と北平文化』,『新潮』34卷9号(1937年9月),第189页。

④早濑讓『歌集北京』,臼井書房1942年版,第208-209页。

集所作的“序”中所张扬的那样,这部歌集“从一方面来看是日华亲善的一种表现”<sup>①</sup>。

1939年7月1日,高木健夫在北京创办了《东亚新报》(1939—1945)并出任主笔。该报是“北支派遣军”解散了已有的现地日语报纸而组建的宣传媒体。高木的这部署名“高建子”的文集《北京百景》之相关章节曾在《东亚新报》连载;成书出版之际,德光衣城在序言“必胜序曲”中称,“这是作者以对祖国热烈的爱为基调,以满满的对中国之爱为保证而写出的正确而又尖锐的北京批判、北京介绍”,描述的是北京从“古都蜕变为新都的步伐”。<sup>②</sup>在该书中,高建子以“北京通”的姿态介绍了北京的人情风物,设有天桥八景、城楼六景、紫禁城四景、小姐的风俗、北京的日本色等章节。在这百余篇短文中,高建子对北京沦陷后的北京风土人情乃至北京日本人社会予以了全景式的介绍。先从第75页的以下引文入手:

“喂,北京怎么样?……”

跑在前面的洋车上的丈夫模样的青年冲着后面大声喊着。

“真好!”

年轻的妻子(似乎是昨天刚到北京站的样子)以尖细的女高音感叹道。

“北京怎么样?”

那就像在炫耀自己的古董一般的年轻丈夫,必定是住在北京的人。

不难看出,侵入北京并对其实施有效统制后的日本人已将这座城市视如己物,观察心态发生了“反客为主”的巨大变化。较之于其他北京指南的拖沓冗长、文字堆砌,高建子的北京评论短小精悍,颇见“一家之得”。依出现频率,可依其写作旨趣将文章归类如下:

一、宣扬“大东亚共荣”精神,贬斥西洋文化,批判欧美的中国侵略。作者认为北京是“亚细亚的公园”、“亚细亚思维的散步场”(38页);来到天坛,发现此处充斥着日本人的面孔和日本色,认为“天坛变成了日坛(“日”指日本)”,是“新东亚的风景”(29页);而“燕京大学总让人觉得是个讨厌的大学,通往圆明园废墟的路更是令人生厌的路”(33页),将西方天文学东渐中国视作愚弄中国人的、“宣教侵略的唯一武器”(107页);“在日华人已成为一体、致力于新中国建设的今天,对我们来说,交民巷的存在是最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了”(80页);基于中、日、东印度女性的诸多共同点,将之称作“女性共荣圈”(120页),作为北京“近代化”的标志,自行车在该作中不断出现,作者甚至将年轻女性骑自行车称作“新秩序的风景”(118页)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批判欧美的中国文化侵略之同时,却对日本对中国曾经有过/正在进行的侵略、殖民绝口不提。此外,作者还观察到“中央公园的风俗,而今正处于新秩序建设过程中,有着让人吃惊的东洋式的日华混淆之多样性”(57页);提倡中国男青年与日本女青年的所谓“兴亚型恋爱”(66页)。从风俗的中日融合到男女通婚式的“混血”,凸显日常生活中的中日“亲善”与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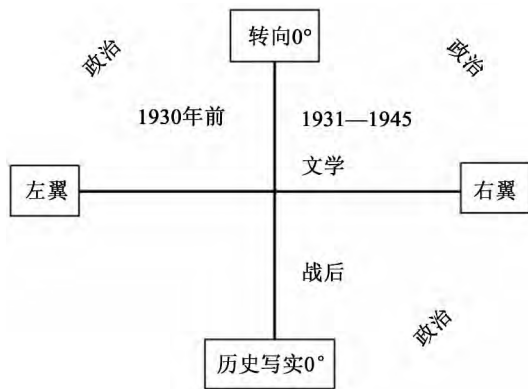
二、感伤于中国古典文化之衰败,对“东洋”文化价值的确认。在孔庙,作者认为孔教已彻底被中国人所厌弃,壮丽的殿堂不过是虚伪的空壳,进士碑只是“忧郁的墓场”(2、3页),传心殿、文华殿、文渊阁等建筑则是“巨大的死的沉默”(23页);在作者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盲目崇尚西洋学问,反倒是国子监中才蕴藏着东洋的大学问(4页);在琉璃厂,作者看到了不屈从于“近代化”的强韧(8页)。面对北京古都遗迹之废坏,触目感怀之情与明治、大正时期的日本文化人别无二致;而对中国古典文化为代表的东洋价值之高扬,则决然不同于前代,极合时宜地迎合了官方的“大东亚话语”,呈现出明显的“时局性”。

三、对在京日本人行为的批评。作者认为在京日本女性乱扔卫生纸丢尽日本颜面(27页);抨击“日本绅士”在北京傲慢粗暴对待人力车夫、随地大小便的行为,讽刺其为“北京的日本色”锦上添花;作者呼吁断然“打倒”这些轻浮的“日本色”,“所谓的日本色……必须是对兴亚首都北京发挥精彩作用的‘文化之色’”(125页)。这部分罕见地面向日本内地读者披露了北京日本人社会的不检点,尽管这种批判比较表层化、有选择性,但毕竟也呈现了部分的历史真实,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日本宣扬至今的、本质化的、优越的“日本国民性”。事实上,该作出版的两年前,作家立野信之(1903—1971)也曾撰文批评日本人在北京“不像日本人”的行径。曾作为无产阶级作家而发表反战作品的立野在1930年被检举违反《治安维持法》,翌年在狱中决定放弃信仰,成为“转向作家”。立野堪称“文坛变色龙”,其一生历经数次“转向”(如下图所示):

<sup>①</sup>早瀬讓『歌集北京』,白井書房1942年版,序3頁。

<sup>②</sup>高建子『北京百景』,新民印書館1943年版,「必勝序曲」。

从20世纪前半叶日本文学发展的脉络上来说,立野信之的存在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象征性,揭示了近代以降甚至延至今日日本政治对文学、思想的威压,具有时代标本的意义。他出版于1941年的作品集《黄土地带》集结了大部分战争时期涉华题材的作品。在该书序言中,作者毫不讳言自己作为关注“在支那大陆以‘战争’的形式进展下去的日本之命运的一个国民作家难以压抑的热情”。有趣的是,立野虽然鲜少对日军在华的兽行予以揭露,却像高建子一样批判了在京日本人的种种不雅的举动。在收入该文集的《讨厌日本人》一文中,立野称其一位在北京的日本友人对来华日本人提出以下期待:一、没有一、两万日元者不许来华;二、男人身高须五尺二寸以上、女子身高须五尺以上,在容貌风采上让人不快者不可来华。如此,“即便是走在路上的日本人看了,也会觉得日本人绝不劣于西洋人,是出色的人种,从而衷心敬服日本人。”战时语境下人的自然容貌被赋予了“丧权辱国”抑或“扬我国威”的政治意义。而立野却通过个人的切身经历对此说表示赞同:



实际上……如果看到了东单牌楼附近坐着洋车的日本人,你常会不禁叹气:这是日本人吗?像家鸭一样的女人,提着嗓门嚷着“你的”、“我的”、“快快的”等非支那语的支那语——在支那人说来,那是日本人式的支那语——在洋车上像青蛙一般张着大腿的、贫弱的日本人那傲慢的架势,并不是让人钦佩的风景。很遗憾,不论体格、服装还是行仪,日本人比支那人还要贫弱。<sup>①</sup>

立野提到,有鉴于此,日本宪兵队和领事馆警察对在京日本男女的着装和坐洋车的行仪提出了郑重的要求“妇女不可着浴衣赤脚出门,不可不穿袜子出门等等,男人亦不可浴衣赤足,不可在洋车上吸烟,走路不许大声唱歌等等。”<sup>②</sup>在中国土地上以西洋人为假想敌的观念固然是政治、战争层面日本与英美对立关系的日常生活折射,同时这也是近代以降日本人面对西方人“人种”意义上深刻“劣等感”的表现。内海爱子的研究显示:

设在陆军的战俘管理办公室指示新闻媒体要定期对“白人战俘”题材进行报道。报纸和期刊定期地刊登有关他们劳动场面的照片。举个例子,1942年11月8日东京版的《朝日新闻》(Asahi Shinbun)刊登的要闻如下:

美军和英俊战俘为日本作出贡献,  
蓝眼睛的劳工抬着米桶,  
带着感激之情,愉快地参加体力劳动。

“蓝眼睛”这个词向读者们传达的是一个“Hakujin”(白种人)的原型形象。……美军和英军战俘在日本人的监督下劳动的景象提高了日本人的战斗意志。……让白人战俘在日本出现,也是为了驱除日本人的欧洲“崇拜”。<sup>③</sup>

就像底片与正照的关系,须以此种特殊手段“驱除”恰恰印证了日本人面对欧洲的劣等感之深,欧美崇拜之剧。

较之于以上种种写实性作品,立野信之战时的历史题材创作显得别出心裁。194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北京之岚:义和团变乱记》以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为题材,以诸国大使、义和团、清王朝之间的纷争以及清王朝内乱两条叙事线索推进,是日本全面侵华的8年间较少见的北京题材历史小说。在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之际,立野信之竟有闲情去挖掘历史题材,恐怕弦外有音。关于八国联军侵华这场日本直接参与、并其主导作用的战争,小说如此定性:

在日本军眼里,从一开始便视义和团和支那军之辈如无物。也不曾有过要在北京濒临危险之际救

①立野信之『黄土地带』高山書院1941年版,第352-353页。

②立野信之『黄土地带』高山書院1941年版,第354页。

③内海爱子《日本的种族主义、战争与战俘经历》载马克·塞尔登·埃尔文·Y. 索主编《战争与国家恐怖主义——20世纪的美国、日本与亚洲太平洋地区》张友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125页。

援同胞财产、主张权利等小家子气的念头,更毫无趁乱打劫、从而获得特别权力之图谋。那些事情统统都是侵略主义,正是日本的国策所嫌恶者。

如此说来,日本出兵究竟是何用意?一言以蔽之,便是让不了解日本的国家了解日本真实的雄姿。对不了解日本、因此有错误想法者,不得不砸下虚心之铁槌,那便是被蔑视、被践踏的东亚之盛怒。

那是日本自肇国伊始用兵之时,便流动于其深处的伟大精神之发露,也是我们的动机。因此,应将其命名为“圣战”。<sup>①</sup>

将侵略战争粉饰为“圣战”的立野信之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自欺欺人式的强制“弥合”是荒诞不经的。小说中在写到清政府向11国宣战后、日本安藤大尉的训话时评论道“这里虽小,但是公使馆区域,我们在所谓国际竞争场之中。在这里,日本的立场诚然是微妙的。”<sup>②</sup>事实上,欲洞悉其“项庄舞剑”的创作旨趣,且由该作“附记”尝鼎一脔:

进入北京城后的各国军队,因最初占领区域未定,城内呈现出一片混乱的景象。不久关于警备区域达成了协定,其后秩序稍见恢复。但是,除日本之外的各国兵士,依然每天粗暴掠夺。支那人因惧嫌那些区域,大部分无家可归。偶尔归家的人带着家财器用搬到日本的警备区域。

因此,在日本的警备区域里,支那人人满为患……日本军非但未曾粗暴掠夺,反而对邻国支那土地上发生的不幸之事深为悲愤,派出大军将支那从欧美列强的分割中保护起来,给予支那以秩序与活路的真意,民众每个人都明白。

紫禁城——那红墙黄瓦、神秘的东方样式、古风庄严的建筑鳞次栉比。占据这些宫殿自始便是各国军队垂涎的目标。那里藏着多少丰富的奇珍异宝,让各国人都蠢蠢欲动。

但,日本军飞速赶到紫禁城,向守备城门的支那军晓以情理,使之无流血开门。因为这一努力,紫禁城才免受纷乱的掠夺与破坏,各国军队仅以检阅龙椅及其他物件之名入城参观。<sup>③</sup>

立野笔下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日本军队俨然成了对中国、中国人民充满仁义与怜悯之心、对其遭遇似有切肤之痛的“文明之师”与“重义之师”;同时,作品将当年的盟友们加以恶魔化描述,意在凸显紫禁城惨遭涂炭乃西方军队之过,从而将战争责任推卸殆尽。中国由八国“公敌”转变为“保护对象”,西洋人由盟友转变为暴虐的“侵略者”,这便是太平洋战争前后典型的“亚洲门罗主义”文学映像。而在作者笔下,日本参战是被迫无奈之举(当然不会提及此前的对华不平等条约和侵略等),同时侵略战争中残暴作恶的日本俨然转变为“道义”的化身。柄谷行人在批判战后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评论时指出:

“战争的二重性格”是指,对日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是对亚洲的侵略战争,同时又是把亚洲从西方列强手中解放出来的战争。……然而,这种二重性格的“分解”本身很危险。……这几乎是宗教性的逻辑,即,未经历作恶就不能获得救赎。不过,近代日本的确是置身于这样的逻辑结构中的。<sup>④</sup>

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在《强国论》(1833年)中为将新兴强国普鲁士之崛起合理化、在该国的历史进程中发现“正义”与“力”的统一,在理论上提出了“Moralisch Energie”(道义的生命力)的概念。他写道“只有依靠这种道义的生命力才能在竞争中打败竞争对手”(《政治问答》)。在兰克看来,世界历史上“强国”的胜利并不单纯是“力”的胜利,实质上乃是“道义”的胜利。兰克的“道义的生命力”概念被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日本思想界借用,成为京都学派精英们在“世界史哲学”论证中进行理论再生产的重要武器。他们认为日本冲破西洋诸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统治,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正是新世界史的“道义的生命力”之体现,并以此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辩护。<sup>⑤</sup>关于日本所谓“道义”的规准,丸山真男在讨论“现代日本政治的精神状况”时指出,“国家主权一元化地占有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的结果,便是国家自己掌握着内在正当性的规准,因此,国家对内以及对外活动不服从任何一个超越了国家的道义规准。”<sup>⑥</sup>因此,京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铃木成高在战后出版的《世界与人性》(1947)中反省“在日本,国家的道义

①立野信之『北京の嵐:義和団変乱記』,博文館1944年版,第401-402頁。

②立野信之『北京の嵐:義和団変乱記』,博文館1944年版,第260頁。

③立野信之『北京の嵐:義和団変乱記』,博文館1944年版,第447-449頁。

④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頁。

⑤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3卷),那庚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8頁。

⑥丸山真男『現代政治思想と行動』(増補版),未来社1967年版(26刷),第17頁。

性和实力性两者没有用合理性作媒介将其结合起来,而恰恰相反,是想排斥这一合理性的媒介。这正是缺陷之所在。……结果是实力性背叛了道义性而变成暴力性,道义性最后也只能堕落为欺骗性而已。”<sup>①</sup>尽管“义和团运动”题材看似无关当下战争现实,但立野信之颠倒是非黑白,推卸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罪责,强化日本的“道义性”,热情为现实意义上的日本侵华诡辩。或因此故,竹内好在《所谓的描写支那》一文中对立野信之的北京题材创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抨击。<sup>②</sup>

立野信之在《黄土地带》的前言中提到,为其“北支·蒙疆旅行”提供了极大便利的三位重要人物中出现了“原(日本——引者)军宣抚班长八木沼丈夫”<sup>③</sup>。事实上,邀请斋藤茂吉造访“满洲”虽是满铁情报科多年来的计划,而登门拜访最终促成此行、其后又自充向导的也是这位供职于满铁的歌人八木沼丈夫(1895—1944)。八木沼作为歌人并不出色,而令其声名远播、令日本侵华史铭记的是另一重身份——侵华时期日本对华“宣抚工作”的精神教父和实践层面的核心指导者。据八木沼自己的说法,“满铁寄望于(斋藤——引者注)先生的是,从容地游览满洲,在缺少艺术浸润的满洲,留下巨匠的芳香与神韵。”<sup>④</sup>1944年,八木沼客死北京。作为与之惺惺相惜的知己,斋藤茂吉在《短歌中原》杂志终刊号《八木沼丈夫先生追悼号》上撰文(后收入《遗稿 八木沼丈夫歌集》)盛赞逝者是“作为社会人,是国家层面上重要的伟人”。这位政治/文学双面人曾在生前出版了歌集《逾长城》,力图在歌集中表现出在侵略战争中超然事外的洒脱、风雅。但必须认识到,与中国风花雪月的相遇多是八木沼对华“宣抚”途中的邂逅,是伴随着枪炮声、践踏中国人的尸体、沾染着中国人鲜血的“风雅”,他的“爱美而黩武”正是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揭示的日本国民性内在矛盾的表现。而斋藤茂吉和立野信之两位作家的中国行以有如此深厚官方(军方)背景的八木沼为向导,其中国认识、战争认识的倾向性便可想而知、不足为奇了。

#### 四、“女尸之都”中“超然事外”的漫游者

在“世界史的立场”之外,京都学派还面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宣扬“主体的立场”,指责他们对战争所持的批判、旁观态度,是“在现实中没有把主体性责任感当作思想本身内容”的一种立场,西谷启治等认为,“生活在国家之中的国民”“应该始终立足于国家和国家生活中的政权这一方面,对国民本身从内部以否定方式提高其正义价值,进一步使自己的国家在全世界国家关系中成为主持正义的主体”,所以,“也应该在这种主体性实践的立场上形成自己的思想”。<sup>⑤</sup>社会思想家、战后先后成为广岛大学首任校长和文部大臣的森户辰男(1888—1984)在出版于1941年的《战争与文化》一书中指出,“时至今日之阶段,战争这种极为原始的事情都非常需要高度的文化装备;同时,被称作文化母胎的国民与国家,为了其生存与发展,也屡屡被置于不得不渡过战争难关的境况。因此,实际上我们迫切期待在战争的酷烈中不看丢文化、在精心抚育文化的过程中不辞肯定战争的现实态度,以及更进一步地,忍从、担当、开拓难以回避的世界性的、国民性的命运,以及精进于吾人的文化使命之理想主义热情与不屈的努力。”<sup>⑥</sup>西谷和森户所倡导的是作为“国民”的文化立场,他们所欣赏的便是立野信之这般有着“国民作家”自觉的文化人,所批判者,应该是类似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这般政治旁观者。

以北京题材为视角,单从作品来看,还有一些看似超然事外的“漫游者”,著名作家阿部知二、横光利一(1898—1947)、伊藤整(1905—1969)、川端康成等即为此属。例如,1939年小说家、文艺评论家伊藤整来京,并写作了题为《在北京》<sup>⑦</sup>的散文,记述了其在京期间,在小田岳夫、汤浅克卫、秋泽三郎等人带领下驱车游北京的“异文化体验”,其中未见与“战争”相关的任何议论。1941年,川端康成来到中国,在“新京”(即今之长春,时为伪满洲国首都)与北京进行了数天的教育之旅,在同年8月发表的短文《从新京到北京》中,作者描述了其在京观摩日程:出席北京市全市小学生的日语汇报演出、北京市中小学春季体育运动大会,参观

①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3卷)那庚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8—139页。

②竹内好『支那を説くといふこと』、『中国文学』1942年1月号,第502页。

③立野信之『黄土地帯』,高山書院1941年版,序2、3页。

④八木沼丈夫著、八木沼春枝編『遺稿 八木沼丈夫歌集』,新星書房1969年版,第246页。

⑤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3卷)那庚辰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6页。

⑥森戸辰男『戦争と文化』,中央公論社1941年版,序2页。

⑦伊藤整『北京にて』(1939年10月1日『セルパン』第105号に「北京」と題して掲載),『伊藤整全集23・自伝のスケッチ他』より,新潮社1974年版,第512—523页。

了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描述居多,评论极少,只是在出席北京市小学生日语汇报演出时指出了北京日本人教师的匮乏;<sup>①</sup>而对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罪行及沦陷中的北京人的生活状况等则不愿置喙。以下,笔者将论述中心置于对阿部知二与横光利一两位作家的讨论上。他们的北京之行并非浮光掠影的观察,而是蕴含着诸多对北京、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思考。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两年前的1935年9月1日至13日,阿部知二来到北京逗留了近两个星期。基于此,自1935年10月起至1937年10月间,阿部先后创作了数篇北京题材随笔、小说作品;<sup>②</sup>1938年,在以上试笔的基础上创作了集大成之作——长篇小说《北京》<sup>③</sup>。在小说的跋语中,作者一再拒绝将该作视为“时局”文章,但事实上这一系列北京题材创作很难作如是观,毋宁说这些作品为今人提供了观察“卢沟桥事变”前北京波谲云诡的紧张局势、探察战争爆发前后日本文化人对华心态的最佳标本。在《北京》中,对华行动问题是行动主义文学倡导者之一的阿部知二的核心关切。在他看来,以王子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日本为对象的“抵抗”行动是阴柔的、纸上谈兵的、不理智的和注定失败的,而以加茂、满铁青年为代表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行动”则是阳刚的、积极的、富于美感的。尽管希望加茂青年对一些冒险“行动”持审慎态度,但在日本人对华行动的总体评价上,阿部是积极认同的,只不过其主张的是理智、谨慎的行动,而非冒险、鲁莽的牺牲。长久以来,阿部知二被视为日本文坛重要的“人道主义作家”,而他在日本对华侵略的问题上却并未对本国的侵略行径有所反省和批判,反而鼓动一种积极、审慎的对华行动。在作品中,主人公——日本大学教师大门勇甚至作为“帮凶”直接参与了加茂青年打死中国老车夫的暴行。面对本国对异国的侵略,作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操守与信仰都被弃若敝屣。<sup>④</sup>如此观之,其后“作为理性派作家已有定评的阿部知二”在爪哇岛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也无足为奇了:“对于近日世界无休止之纷乱,足以发出世界平安之呼声者在何方?……如果说它必须是真正具有力量与道德者,则余诚惶诚恐以为除我大君(天皇——引者注)之外无他人也。体察上心,我等唯有使之实现。此非梦想而是切实之任务也。”<sup>⑤</sup>

《北京》出版半年后的1938年11月,横光利一来华,在上海、青岛、北京进行了为期约40天的旅行。作为北京之行的产品,他的散文《北京与巴黎(备忘录)》于1939年2月发表于《改造》杂志。文章开头,横光利一称“要是芥川今天还活着,他更感兴趣的,肯定不会是他喜爱的北京,而是他所厌恶的上海。……这次去中国走了一遭,我痛切地意识到,这种东亚方式业已成为我们最为迫切需要的一种政治学。”<sup>⑥</sup>横光的北京之行,毋宁说正是为探究中国这一“东亚方式”谜题而来的:

每次踏进中国,尽管我把这之前提到的东亚看做是一个远远超出我所能把握的范围之外的问题,但它还是压迫着我的大脑,挥之不去。这种情况我想并非只是我一个人遭遇到吧。一个人去到某地,如果意识到自己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来处置所面临的处境,那肯定会感到恼火。我在中国遇到过不少在那儿有着相当长的生活经历,并且人品相当出众的人,屡屡听到他们这样叹息:中国到底怎么回事,实在弄不懂。每当遇到这种时候,我也身不由己地想依样画葫芦应和上一句,可这样的谈论,便表明了那里的政治对精神不具备调节的功能。“正因为弄不懂,我才……”,那个傍晚,我一边不断寻思着这个问题,一边溯中国海而上,前往北京。<sup>⑦</sup>

横光利一称“现在,出门旅行让我最感愉快的,便是这个地方的传统,以及发生在这上面的变化”<sup>⑧</sup>。“我一直有再度重访北京、巴黎之想……这两个地方,恐怕每次去都会有所变化”<sup>⑨</sup>。“去初次踏访的地方旅行的一大乐趣,便是从中感受自己在想像中所构建起的对一块地方的幻想,与它实际的风物之间,究竟存在怎样

①川端康成『新京から北京へ』(『少女の友』1941年8月号,『川端康成全集』(第27卷)より,新潮社1985年版,第300-303页。

②视野所及,有『隣国の文化——北平の印象から』(『読売新聞』1935年10月26日朝刊10面;『北京雑誌』(『セルパン』1935年11月号,第42-46页;『美しき北平』(『新潮』1935年12月号,第100-104页;『燕京』(『文芸』1937年1月,第20-72页;『北平の女』(『文学界』1937年5月号,第215-238页;『王家の鏡』(『改造』19卷11号,支那事变增刊号,第277-294页)。

③阿部知二『北京』,第一書房1938年版。

④关于该小说的具体论析请参见拙文《“去政治化”与“理智的行动主义”的破产》,《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

⑤引自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赵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页。

⑥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⑦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86页。

⑧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⑨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的差异。这种感受自然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谁都会做的。不过,请注意,要是从自己的幻想与实景实物之间感觉不到任何差异的乐趣,预想压根儿落了空,徒有失望之感,那就划不来了。”<sup>①</sup>关于初次踏访的北京,横光原本是抱有期待的,而结局却令其颇为失望并为之懊恼。在这篇并不算长的散文中,横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给出了多角度的阐释,择其要者如下:

1. 北京有消费都市一说。委实不假,在这座都市里,历历在目的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从来不事生产的人,却代复一代,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地琢磨着,人可以将消费穷竭到何种程度。颓废的极度积累,厚重得使人喘不过气来,不由分说地制服了步入此间的人们的反抗。……由于大脑的麻木已具某种品格,被觉得理所当然,因而在大脑丧失了某种功能却又在毫不在意的情形下,恶魔已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只要一个人不想与恶魔抗争,那么一旦进入北京,他身上那些现实世界中的健康之物便会丧失殆尽。在这里,比起有精神质地的美来,虚诈的美更具有美的精神。一个人,如果因为疲劳和孤独,或很容易受到诸如此类情绪的侵袭,那么他也许会觉得北京是世界上最美最舒适的都会。

2. 这就像一具被敷彩后置放在客厅里、嫣然而笑的尸体般的都会,它那女性气质的壮丽,委实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延续了好几个世代的国都却为异族所征服,征服者一旦崩溃,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异族前来改朝换代,在这死灭的肉体的堆积中,残存下来的唯有这等令人发狂的东西吧。想到这些,我便感到十分茫然。确实曾经存在过的优秀的东西,除戏剧还保存着,几乎已经灭绝,以致庞大的拙劣之作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林海环围着一座孤单单的祭坛。这里最能打动人心的,如今只剩下一些哀婉小曲的抑扬顿挫,而大众所喜爱的则是拙劣之作。以拙劣之作充当杰作并任其长久流传的北京,不断讲述着他国根本无法与之匹敌的罪孽深重的故事。最初是某个朝代犯下了罪孽,随后起来将其埋葬的另一个民族又泛滥成灾,覆盖其上,在这永无休止的循环往复中,如此巨大的装饰物便不经意地完成了。这恰好可以称作是自然的杰作。它并非文化之物,而是如同山川一样的自然之物。……而在中国,北京又要比其他所有城市更适合于安眠。北京这座城市就跟尸体似的,根本无从分析,即便作出分析,那也毫无意义,无异于让它死去。北京的美便是这样一种如同死亡一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美。……然而,北京又显示着怎样的能耐呢?它那似乎要告知人们唯有政治才是万能的外交手腕,总让人产生某种被愚弄的沉重感。中华民国因嫌厌北京而决意将科学之都迁建南京,可以说是一种明智的决策。

3. 我在巴黎漫不经心地走在街头时,常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动用着某种适合于我的分析能力。……可是,去北京,北京城的原点在哪里最初是不知道的。可以说,在北京所见到的,尽是些丧失了自我的东西。一走进这座都市,我们便会生出一种仿佛回到了生前故乡的感觉。在这里人们对什么都不会很介意。……以前,听说有不少西洋女子因为见了北京的秋月而发狂,确实如此,这月亮已硕大得无法称其为月亮了,若一直这样彤红硕大地显现在虚空之中,那人的精神便会从现实逃逸而去。中国那些卓越之士的分析能力都集中在天文上,这一方面是思想逃离自我,为天空所吸引的结果,另一方面很可能中国人的精神原点就潜藏在这月亮深处。如果真是那样,天子向上苍祈求五谷丰穰这一修筑天坛的构想也便不难理解了。开阔的宫殿广场,宏大的屋顶,都可以看作是对支撑日月星辰的天地之力的依恃。<sup>②</sup>

欧洲之行,让横光利一感觉到“日本最明显的非文化倾向,便是知识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嫌弃自己的祖国。对日本说来,我以为建立民族自信要比什么都来得要紧”,“欧洲的理性和中心精神,终究会转向东方”。<sup>③</sup>而这位爱国者、国粹主义者关于东洋古都北京的整体认识可归纳如下:这是一座毫无生气、近似女尸、与近代科学绝缘却充满着政治权谋、让人丧失自我的“生前故乡”;在不断的朝代更替之后,优秀的艺术已丧失殆尽,“文化古都”中的人们而今生活在难称之为“艺术”的粗俗文化氛围中。换言之,横光利一对本国文化价值的确认是通过对欧洲和中国文化价值的批判建立起来的。如此观之,太平洋战争时期,为日本偷袭珍珠港一战中“特攻”战死的9位士兵写作《军神赋》,积极参与“大东亚文学者会议”决议文之起草并在前两次会议中发表演讲、在战争末期又写作《特攻队》歌颂特攻精神的横光利一在战后被作为“文坛战犯”追究责任,是有其文化和思想根源的。

①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②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91页。

③横光利一:《感想与风景》李振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188页。



“北京通”村上知行(1899—1976)在《旧支那·新支那》中的判断几乎是横光利一的翻版。1934年村上作为《读卖新闻》特派员被派往北京,在京十余年,并与中国女性结婚。作为在京著名的“支那通”,村上是不少日本文化人在京期间的重要向导,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村上知行的系列化北京论述<sup>①</sup>及其对中日关系、战争局势的观察之导向性意义值得关注。在《北京·天津的文化》一文中,村上对一般文化人对北京文化精髓即王者之气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北京文化的实质不过是封建文化的豪华版,其典型的遗物便是紫禁城;即便北京尚荡漾着王者之气,那也是尸骸散发出的恶臭,即便北京有点文化,也只是以灶王文化为代表的劣等文化。<sup>②</sup>对于自己的北京同行——知识分子们,村上在《北京的文人》中针对章乃器要求中国青年不再沦为半殖民地知识分子的主张,开出了复活中国传统的文人精神以拯救中国(青年)的药方。其悖论在于:既然中国人的“文弱的和平主义”常是误国之根,并因此饱受批评,却要鼓动中国知识分子“复古”;既然称赞“北京文人”代表了“东洋文化的精髓”,却对本国的文人语含嘲讽。如果说面向本国的“去‘文人’化”、“去中国化”是日本“武威”传统与近代“世界原理”的共谋,那么当它与其对中国知识分子指向“和平”的改造逻辑相叠加,村上欲消泯中国文化人的抵抗意识、从文化层面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殖民心态便跃然纸上。<sup>③</sup>

沿着横光与村上的思想脉络下去,一户务所提及的日本侵略使北京“国际化”、“近代化”之说便显得有据可依。中国古典文化衰败、现代无文化,因此需要日本进入、传播新的文化,这是近代以降日本殖民者们一贯宣扬的逻辑。如果说战争时期对北京氤氲的“东洋精神”之褒扬是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文化人回应国家意识形态需要而作的“事异则备变”式的战术调整,那么,横光利一的北京观察与批判是典型的福泽谕吉思维之继承。打个比方,就如明治时期成岛柳北的《柳桥新志》继承了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的江户文人气质,这种无意识的“传统”并未因作为政治事件的“明治维新”所隔断,我们甚至可以将1937年出版的永井荷风的《濠东绮谭》视作向成岛柳北致敬之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时,政治史、战争史无法强制切割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后者并非完全是受制于前者的傀儡,有些观念一旦形成并固化为“传统”,便会作为潜流、“执拗的低音”(王汎森意义上的)呈现出极强的历史承继性,其影响甚至绵延至今,在不经意间悄然“溜进”文学文本,从而形成与“时局”异样甚至相颉颃的色彩与势力。

当然,此一时期,来京的日本文化人中也并非全无心存善意者。作为在北京生活、工作有年的“老北京”,熟稔北京风土人情的清水安三几乎是站在“自家人”的立场,从饮食到季节感向一般日本读者推介北京举世无双的“美”,“感谢上帝让北京成为我的第二故乡”<sup>④</sup>。1940年6月,东京的文友堂书店为著名画家桥本关雪(1883—1945)出版了散文集《支那山水随缘》。桥本在前言中称,“收入本书的画与文字大多是事变后不久即为大每(即《大阪每日新闻》——引者)和朝日两报所执笔的。”<sup>⑤</sup>作为艺术家,桥本对北京还是充满着善意的,“二三年前听说那城墙要被拆除,虽是他人之家国但仍感爱惜,来了一看,正阳门附件只被拆了一点点,松了口气。”听说包围着紫禁城的外城墙将来恐将被拆除,桥本指出,“虽是多余的担心,但我希望能深省一下,那里累积了人智与财力所换不来的力量与历史。……当我们将都市也作为一种艺术看待时,北京便是世界上最大级别的艺术品。”<sup>⑥</sup>遗憾的是,带着“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世界文化价值观念、关切中国艺术的现状与未来者少之又少,且其带着善意的言论又有被“大东亚主义者”利用之嫌,但这也代表了日本全面侵华时期来京者中的一种富于文化人良知的声音,与鹤见祐辅、松本龟次郎等的北京书写、中国论述形成了另一条无法被政治与战争所阻断的细小潜流,势力弱小但弥足珍视。这股理性、友善的力量绵延至今,成为中日关系“绝望中之希望”。

(责任编辑:陆晓芳)

<sup>①</sup>村上知行『古き支那 新しき支那』改造社1939年版『隨筆大陸』大阪屋号書店1940年版『北京の歴史』大阪屋号書店1941年(再版);『北京十年』中央公論社1942年版。

<sup>②</sup>村上知行『古き支那 新しき支那』改造社1939年版,第32-46頁。

<sup>③</sup>关于该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拙文《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悖论与病理——以村上知行的“北京文人论”为释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sup>④</sup>清水安三『支那の心』隣友社1941年版,第38-43、66-75頁。

<sup>⑤</sup>橋本関雪『支那山水随縁』文友堂書店1940年版,はしがき。

<sup>⑥</sup>橋本関雪『支那山水随縁』文友堂書店1940年版,第71-72頁。